



New International Financial Order:
China's Role

国际金融新秩序： 中国的角色

■ 贝多广 罗煜 等著

 中国金融出版社

New International Financial Order:
China's Role

国际金融新秩序： 中国的角色

■ 贝多广 罗煜 等著

责任编辑：贾 真

责任校对：孙 蕊

责任印制：丁淮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国际金融新秩序：中国的角色 (Guoji Jinrong Xinzhiyu; Zhongguo de Juese) / 贝多广, 罗煜等著. —北京：中国金融出版社, 2016. 7

ISBN 978 - 7 - 5049 - 8584 - 2

I. ①国… II. ①贝…②罗… III. ①国际金融—研究②人民币—金融国际化—研究 IV. ①F831②F82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6) 第 141102 号

出版 中国金融出版社
发行

社址 北京市丰台区益泽路 2 号

市场开发部 (010)63266347, 63805472, 63439533 (传真)

网上书店 <http://www.chinafph.com>
(010)63286832, 63365686 (传真)

读者服务部 (010)66070833, 62568380

邮编 100071

经销 新华书店

印刷 保利达印务有限公司

尺寸 169 毫米 × 239 毫米

印张 16.75

字数 239 千

版次 2016 年 7 月第 1 版

印次 2016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定价 38.00 元

ISBN 978 - 7 - 5049 - 8584 - 2/F. 8144

如出现印装错误本社负责调换 联系电话 (010) 63263947

目 录

- 导论 1
- 第 1 章 金融危机暴露国际金融旧秩序的缺陷 24
 - 1.1 次贷危机凸显全球金融体系脆弱性 24
 - 1.2 危机前金融监管国际合作存在的问题 25
 - 1.3 现行国际货币体系维系的特征 27
 - 1.3.1 国际货币体系的演变 27
 - 1.3.2 以美元为核心的国际货币体系 30
 - 1.3.3 维持美元核心货币地位的必要条件 37
 - 1.4 美国“双赤字”的不可持续性 40
 - 1.4.1 美国经常项目逆差和财政赤字现状 40
 - 1.4.2 美国“双赤字”的可持续性分析 42
- 第 2 章 后危机时代的国际经济格局演变 44
 - 2.1 国际金融危机加深了发达经济体的相对衰落 44
 - 2.2 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市场与发展中经济体崛起 49
 - 2.3 此次危机以来新兴经济体国际经济金融地位发生显著变化 52
 - 2.3.1 全球性银行向新兴经济体的资产转移成为趋势 52
 - 2.3.2 国际债券市场份额中，新兴经济体保持增长态势 53
 - 2.3.3 新兴经济体成为国际储备资产的主体 54
 - 2.3.4 国际金融治理中的影响力有限但缓慢上升 55

第3章 危机后国际金融监管合作展露国际金融新秩序端倪 57

3.1 此次危机以来金砖国家采取的积极措施 57

3.1.1 通过 G20 加强协同合作机制 57

3.1.2 通过金砖国家领导人会晤加强协同合作机制 58

3.1.3 改革国际货币体系 59

3.1.4 逐步加强货币结算和互换等合作 60

3.1.5 加快推动本币的国际化程度 61

3.2 次贷危机背景下金融监管国际合作的应急措施和成效 63

第4章 国际金融新秩序的构想与中国的立场 68

4.1 主要国家对建立国际金融新秩序的设想 68

4.1.1 美国 68

4.1.2 欧洲 69

4.1.3 日本 70

4.1.4 新兴经济体 70

4.1.5 主要国际组织 72

4.1.6 中国 72

4.2 中国在国际金融新秩序构建中应持有的立场 73

4.2.1 中国的利益 73

4.2.2 中国的具体对策 75

第5章 新秩序的主要变化之一：更加民主公平的国际货币体系 80

5.1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特别提款权（SDR）改革 80

5.1.1 SDR 改革的背景 80

5.1.2 美国对人民币加入 SDR 的阻碍 83

5.1.3 人民币加入 SDR 的历程 86

5.1.4 人民币加入 SDR 的机遇与挑战 89

5.2 IMF 等国际金融机构的改革在曲折中前行 92

5.2.1 美国多个政府机构反对 IMF 进行大规模改革 92

5.2.2	美国国会多次否决 2010 年 IMF 治理与份额改革方案	93
5.2.3	IMF 份额改革曙光初现	94
第 6 章	新秩序的主要变化之二：新的国际金融机构建立	97
6.1	现有国际金融治理架构	97
6.2	新型国际金融机构的建立	100
6.2.1	金砖国家开发银行	100
6.2.2	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	105
6.2.3	丝路基金	108
第 7 章	新秩序的主要变化之三：国际金融基础设施建设得到加强	117
7.1	国际金融基础设施的相关概念	117
7.2	G20 框架下监管合作的加强	118
7.2.1	宏观审慎管理与微观审慎监管相结合	119
7.2.2	大一统的金融监管模式趋向成熟	122
7.2.3	机构型监管向功能型监管转型	124
7.2.4	《巴塞尔协议Ⅲ》的调整	131
7.2.5	国际金融监管的协调更加重要	135
7.3	新秩序下国际金融基础设施的加强	136
第 8 章	国际金融新秩序建设中的中国角色	139
8.1	中国应以人民币国际化为核心目标建设国际金融新秩序	139
8.2	人民币国际化的收益	141
8.2.1	实现金融领域的“中国梦”	141
8.2.2	规避汇率风险	142
8.2.3	获得铸币税收益	142
8.2.4	有利于债务融资	143
8.2.5	金融体系竞争力的有效标杆	143
8.2.6	金融机构走向世界	146

8.3	人民币国际化的成本	146
8.4	人民币国际化指导原则	148
8.4.1	渐进性原则	148
8.4.2	区域合作原则	149
8.4.3	实力和机遇并重原则	150
8.5	人民币国际化路线图	150
8.5.1	人民币国际化的三个阶段	150
8.5.2	加强与东盟国家货币合作	151
8.5.3	加强与金砖国家合作	154
8.5.4	发挥“一带一路”对人民币国际化的推动作用	156
专栏	货币国际化历史周期研究	156
专栏 8.1	英镑	156
专栏 8.2	美元	160
专栏 8.3	马克到欧元	164
专栏 8.4	日元	170
第9章	以人民币国际化倒逼国内金融改革	179
9.1	人民币国际化推动金融业改革开放	179
9.1.1	金融开放的界定	179
9.1.2	中国金融开放程度较低	183
9.1.3	人民币国际化推动金融开放的路径	189
9.1.4	资本账户开放的利弊分析	193
9.2	金融开放推动金融改革	196
9.2.1	金融改革滞后严重	196
9.2.2	金融开放推动金融改革的路径	204
9.2.3	人民币国际化对国内金融改革的倒逼效应	207
9.3	对实施金融改革开放的建议	209
9.3.1	通过统一金融市场增强自身经济金融实力	210

9.3.2 深化国内金融改革,调整金融结构,提振内需	211
9.3.3 积极调整储备资产,扩大主权财富基金的影响力	214
9.3.4 建立汇率双向波动机制,促进国际收支平衡	217
9.3.5 通过发展非银行金融机构来推进利率市场化	221
第10章 结束语	227
参考文献	230
后记	259

导 论

今天的现实是历史演变的延续，今天的重大变革也在塑造着历史。自 15 世纪“大航海时代”开启全球大市场以来，由葡萄牙和西班牙领衔的全球殖民和贸易体系中的贸易活动使美洲的白银源源不断地运送到欧洲，这些白银货币又通过东西方贸易流入中国，形成了地跨欧亚、美洲的货币流通链条，这一早期的国际货币体系持续了二百多年。从 18 世纪后期开始，工业革命后的英国成为世界霸主，并主导了现代世界体系的形成，以英镑为核心的国际金本位货币体系一直维系到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这一阶段也经历了近二百年。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美国和苏联分别领导东西方对立的两大阵营，这种国际格局一直持续到 1991 年。西方世界的金融秩序以布雷顿森林体系为核心，其始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 20 世纪 40 年代后期，但在 20 世纪 70 年代遭遇重大变故，此后，美元主导的国际金融秩序伴随着经济和金融的全球化逐渐被强化。在 21 世纪到来之际，随着俄罗斯国力衰落，其传统强权风华不再，欧盟国家内部矛盾重重，自顾不暇，新兴势力日本经济遭遇长久的低迷，美国一时间在世界上失去了与之抗衡对手，其强权实力日增。多数人据此认为，“21 世纪是美国的世纪”。然而，“9·11 事件”却为美国政治和军事霸权蒙上一层阴影。随着美国接连攻打阿富汗和伊拉克以及应对恐怖主义，美国国力消耗甚多，其经济也陷入麻烦之中。2008 年由华尔街次贷危机引爆的全球金融危机是美国经济霸权走向式微的历史性分水岭。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蓬勃发展，与之形成鲜明对比。长期以来，在世界范围

内现有国际金融秩序下积累的矛盾和问题凸显，要求改变现有国际金融秩序的呼声日益高涨，建设一个国际金融新秩序的序幕加速拉开。从 20 世纪 40 年代确立美元主导、美国独大的国际金融秩序到如今全球基本形成需要对其进行大刀阔斧改革的共识，仅仅经历了六七十年。因此，在这样一个急速变革的历史背景下研究国际金融新秩序的建设方向，以及中国作为日益崛起的世界大国应当扮演的角色，是一个具有重大理论和实践价值的课题。

本书旨在研究国际金融新秩序建设中的有关重大问题，并探讨中国在这一进程中扮演的角色以及如何制定自己的对策。国际金融新秩序的建设是一个宏大的主题，它包含国际货币体系改革、国际金融机构和国际金融治理机制的改革，以及国际金融监管合作、国际金融基础设施完善等诸多复杂的问题。在这些复杂问题之中，核心问题是改革国际货币体系。从中国利益出发，核心关切就是如何提升人民币的国际化程度，在演变中的国际货币体系中处于举足轻重的地位。根据这一立论，本书抓住国际金融新秩序的主要内涵，分析中国在参与国际金融新秩序建设中的核心利益，论述人民币国际化在其中的关键地位，研究人民币国际化的路径，以及为了实现人民币国际化而需要进行的金融改革和开放的战略。

2008 年的金融危机之后，人民币国际化问题已成为研究热点，理论界、政策界对之进行了大量探讨，推动了许多政策实践的开展，这是非常有益的。同时，我们观察到，现有的研究存在着两个较为普遍性的倾向：一是就人民币国际化谈国际化，研究的视角往往局限在汇率自由浮动、资本账户开放、外汇储备结构调整、加入 SDR、增加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份额等技术性问题，特别是国际金融学科内的问题，欠缺从一种货币国际化的历史视角审视什么因素造就了某种货币能够成为国际货币——包括国内经济发展实力、国内金融发展水平、国际政治经济地位，以及不可多得的历史机遇等基础性的要素，尤其忽视了研究中国国内的金融改革的深入和金融体系的健康发展对人民币国际化的基础支撑性作用。二是就中国谈中国，政策主张通常局限于中国自身该如何应对国际金融新秩序建设，甚至过分渲染中国对美国经济和政治霸权的挑战和替代，而欠缺对新兴市场国家整体行为举措的研究，特

别是中国作为新兴市场国家的一员，如何能够团结和引领新兴经济体形成合力共同改变不合理的国际金融秩序，如何能分散、弱化人民币崛起所造成的国际上对中国遏制、围堵的张力等诸项问题。

鉴于此，本书从国内金融改革和国际金融合作的角度研究中国在国际金融新秩序建设中的角色问题。我们从国际金融旧秩序的问题入手，通过历史分析，从宏观视角探寻国际经济实力的对比变化，以及这些变化如何造就了历史上的几种成功的国际性货币。本书总结了国际金融新秩序的三大主要变化——更加民主、公平的国际货币体系，新的国际金融机构的建立和国际金融基础设施的完善。本书研究了中国国内金融改革与人民币国际化的互动因果关系，对在这一问题上的争论和疑惑给出了回答。本书还着重探讨了“金砖国家”和“一带一路”沿线经济体的合作优势，论述了国际金融合作对中国参与国际金融新秩序建设的意义。

本书的结论是：国际金融新秩序建设的大幕已经拉开，中国将扮演主要领导者的角色。人民币国际化是中国应对国际金融新秩序的建设的的主要战略对策，且当前的战略机遇期不可错过。中国政府应参考曾经“倒计时”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成功做法，把这一对策上升到国家经济战略层面，采取不破不立、进取与审慎兼顾的战术，以最终实现两大战略目标：第一，按照既定的路线图和时间表，以实现人民币全面国际化的目标来倒逼和引导国内经济与金融改革进程，以实现中国国内金融体系的高度市场化发展并在世界金融市场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第二，利用好 G20 平台，与金砖国家、“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等新兴市场国家、发展中国家“抱团取暖”，合纵连横，改变美元主导国际货币体系、西方主导国际金融治理的局面，重塑国际金融架构，支撑人民币国际化进程。

本书的主要理论和应用价值在于：一是有助于厘清对中国在国际金融新秩序建设中的核心利益的认识，强化人民币国际化在中国国家战略体系中的地位；二是有助于更好地理解中国国内金融改革和人民币国际化的关系，为具体实现人民币国际化提出了可操作的政策主张；三是有助于提升人们对中国与其他新兴经济体进行更紧密金融合作重要性的认识，由此会引发在诸如

合作模式、金融创新等更多问题上的研究。

国际金融旧秩序

国际金融旧秩序就是当前的国际金融秩序，它的根基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形成的布雷顿森林体系，它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国际政治经济秩序中的一个方面。国际金融旧秩序的特征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第一，美元是最主要的国际储备货币和国际结算货币，主导着各国的国际储备篮子和全球关键商品市场的结算。

自布雷顿森林体系建立之日起，美元就成为国际货币体系的中心。布雷顿森林体系实际上是一种以美元和黄金为基础的国际金汇兑本位制，或更明确地称之为“美元—黄金本位制”。它使美元在战后国际货币体系中处于中心地位，美元成了黄金的等价物，美国承担以官价兑换黄金的义务，各国货币只有通过美元才能同黄金产生关系，美元处于中心地位，起到世界货币的作用。从此，美元就成了国际清算的支付手段和各国的主要储备货币。在 20 世纪 70 年代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后，尽管美元取消了与黄金之间的挂钩，但世界其他货币和美元之间的锚定关系并未随之消失，在全球最重要的几大市场中（如能源、大宗农产品、黄金），美元依然是主导型的结算货币，世界各国也依然以美元作为最重要的国际储备货币。近年来，美国经常项目持续逆差，美元大量输出，以东亚国家为代表的出口推动型国家则积累了大量的美元储备，美元在国际储备资产中的占比长期居于高位。尽管 1999 年欧元的诞生打破了美元一统天下的局面，欧元发行规模的上升在一定程度上也弱化了美元的国际储备货币地位，但仍未从根本上改变美元作为全球主导国际货币的地位。

第二，美国控制了主要的国际金融组织和国际金融制度设计，其他国家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在国际金融事务中缺少话语权。

作为布雷顿森林体系的成果，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世界主要国家建立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和世界银行两大国际金融机构。前者负责向成员国提供短期资金借贷，目的是保障国际货币体系的稳定；后者提供中长期信贷

来促进成员国经济复苏。虽然 IMF 和世界银行都是全球性机构，但二者均处于西方国家的控制之下。IMF 的总裁通常由欧洲人担任，而世界银行的行长总是由美国人出任。IMF 的议事规则采用加权投票表决制。加权投票权与各国所缴基金份额成正比，而份额又是根据一国的国民收入总值、经济发展程度、战前国际贸易幅度等多种因素确定的。美国是 IMF 的最大股东，在次贷危机之后 IMF 提出改革方案前，具有 17.66% 的份额和 16.7% 的投票权，在 IMF 的重大决策上，美国拥有一票否决权。相对而言，在改革方案提出前，中国的基金份额仅占 3.996%，投票权占 3.8%。IMF 基金份额和投票权分配的这种不合理现状，使在国际金融治理体系制度设计中，美国、欧盟占据了绝对的主导地位，而广大发展中国家却拥有很少的话语权。在各国的外汇管理实践中，许多国家的货币或明或暗地“钉住”美元，甚至一些国家和地区实行了与美元挂钩的联系汇率制度，事实上逐渐形成和发展成一个所谓的“后布雷顿森林体系”，即与黄金脱钩后以美元为主导的国际货币体系。

美国在国际金融制度设计中的主导权还体现在对超主权货币份额的贡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创设了特别提款权（SDR）作为一种储备资产和记账单位。在人民币加入 SDR 前，IMF “一篮子”货币在特别提款权中所占的比例分别为美元（41.9%）、欧元（37.4%）、英镑（11.3%）、日元（9.4%），没有发展中国家的货币。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一个很重要的职能是对发生国际收支困难的成员国在必要时提供紧急资金援助，甚至协助管理国家财政，但受援助国需要按照 IMF 的苛刻条款进行改革。在发展中经济体遭遇财政金融困境时，IMF 给出的条款多附带政治倾向，指导各国进行经济或制度改革，却时常导致更大的困境，或者让受援助的国家蒙受其他长期利益的损失，如遭遇金融危机的拉美国家和东南亚国家。

第三，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存在严重的国际收支失衡，国际资本流动呈现逆循环，资金富裕的发达国家从资金短缺的发展中国家吸收资本，促进了金融市场膨胀。

按照经济学的原理，资本要流向边际投资回报率高的地方，发达国家资

金富裕，发展中国家缺乏资本，资本应从发达国家流向发展中国家，但是当今全球的资本流动情形却恰好与之相反。国际资本流动呈现一种从发展中国家流向发达国家的逆循环，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存在严重的国际收支失衡。在后布雷顿森林体系下，美元作为一种汇率锚，世界其他国家通过贸易顺差获得美元供给，从而出现了其他国家制造商品而美国发行货币的局面，加之美元发行缺少有效的约束机制，美元持续贬值。同时，世界其他国家又把美元资产投资到美国金融市场，充足的资本供给又压低了市场利率，导致了房地产市场泡沫。这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发达国家拥有成熟、健全和高效的金融中心和金融市场，能够让资金在控制风险的前提下，实现与之相匹配的收益水平。因此，我们看到的结果是，发达国家通过购买发展中国家出口的产品，实现了对发展中国家的资金流入，但这些资金转而又回流到了发达国家的资本市场，被用于支持发达国家的政府开支和金融市场的繁荣，从而催生了泡沫。国际间的商品流动和货币流动看起来就像令人匪夷所思的游戏。“支付给中国用来购买商品的美元第二天就以低息贷款的形式回到了美国，并且随后迅速地在美国的金融系统中重新循环并创造出更多的廉价信用。”^① 有学者认为，至少在过去二三十年内，由于全世界特别是中国相当程度上假想美元可靠的信用，面对中国的贸易顺差或是美国的赤字日益增长，双方都没有采取有效行动扭转这种趋势，甚至纵容了这种趋势的加剧，从而诱发了美国国内各种形式贷款证券化蓬勃发展，尤其与住房有关的贷款证券化产品，以及世界黄金、大宗商品价格的迅速攀升。

然而，对于发展中国家建设急需的资金，目前的国际金融治理机制基本上就是，世界银行、亚洲开发银行、美洲开发银行等国际金融组织，它们会向发展中国家提供基础设施建设等方面的贷款，但仍然无法满足发展中国家的建设需要。根据亚洲开发银行的研究，仅仅亚洲和大洋洲的 30 个发展中经济体，为了满足经济发展、城镇化、减贫等需要，到 2020 年以前每年就需要 7500 多亿美元用于基础设施投资。根据粗略估计，在未来 10 年，发展中

^① 本·斯泰尔：布雷顿森林货币战：美元如何统治世界 [M]。符荆捷等译，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2014：344。

国家平均每年需要在基础设施建设上投入 9500 亿美元，加上发达成员国的需求，每年基础设施总需求将达到 2 万亿美元。根据标准普尔公司的估算，未来全球基础设施投资缺口将达到每年 5000 亿美元左右。因此，当前的国际资本流动和流向实际上不利于全球经济体的公平发展。

第四，各国货币政策和金融监管各自为政，金融业无序发展，在出现金融危机时缺乏有效的国际协调，一些国家甚至出台以邻为壑的政策举措。

由于美元在国际货币体系中独一无二的地位，美国宏观货币政策在某种程度上缺乏制度性约束，这是导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的一项重要根源。在“9·11 事件”之后，美国为刺激经济、支持军费开支，采取了过度宽松的货币政策，美元发行泛滥引发了全球范围内的流动性过剩，全球货币供应量被无限放大，从而使资产泡沫越积越大，金融活动严重脱离实体经济，最终导致房地产泡沫的破裂，引爆了金融危机，并在全球范围内迅速蔓延。在解决金融危机的过程中，美国不顾其他国家的质疑和反对，接连出台三轮量化宽松政策，从 2008 年起陆续投放货币量总计高达 3.5 万亿美元，这种政策在客观上将消释金融危机的成本转移给了全球经济体。

在金融监管层面，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以金融机构全球化和金融业务全球化为主要特征的金融全球化成为国际经济发展的主流。与金融机构的国际化经营存在矛盾的是，金融监管是以国家权力为基础而存在的。虽然金融机构业务实现了全球化，但是监管者没有全球化，国内监管当局由于受主权管辖原则的约束，只能在本国主权范围内行使金融监管权。由于金融业在现代经济中所处的重要地位，各国当局为了追求本国福利最大化，会通过竞争性放松监管来吸引金融资源。部分金融机构利用各国监管要求的不同，通过注册海外分支机构、金融产品异地销售等手段，达到“监管套利”的目的，从而导致对这些机构和业务的金融监管空白和政策失灵，金融集团通过国际业务的转移，充分利用各国在监管上的不同，实现监管套利最大化。此外，金融产品的离岸交易频繁，加上各种衍生品的出现，同时由于网络的发展使金融服务不再受到地域的限制，金融服务完全没有时间和空间上的限制，使集中管理的金融监管当局难以实施监管行为。

各国金融监管当局在国际金融监管方面缺乏必要的沟通和协调，从而无法及时控制并阻断金融风险在全球范围内的蔓延。危机前，各国金融监管当局普遍把监管的重心放在微观审慎监管上。这种对微观金融机构的监管以及重点监管商业银行体系的方法在金融机构混业经营、经营主体法律结构日益复杂化、金融市场高度发达、全球金融体系联系更紧密的情况下已经严重不适应。各监管当局从争取本国福利最大化出发，仅对本国福利负责，进行竞争，不主动合作；大多数国家把金融监管的国际机构当作发生问题寻求应急措施的地方，从而导致了国际金融监管合作的整体效用低下。在国际合作机制本身存在的问题造成推行政策的困难之外，在推行方案上也存在着达成一致的困难。更为重要的是，各监管当局都是以本国利益为出发点对金融监管进行策略设计的，没有把国际间的监管真正提到日程上来。

国际金融旧秩序存在的问题

根据前文对国际金融旧秩序的概括，已经能够看出其存在的种种具体问题，需要进行改革。“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在布雷顿森林体系诞生六七十年后，当今世界的国家间力量对比已经今非昔比，六七十年前制定并基本沿用至今的游戏规则需要被相应地调整，以适应世界政治、经济格局的新变化。这些变化最主要的表现在：美国的霸权实力相对衰落，在世界经济版图上的占比逐渐缩小；欧盟内部还存在不团结的纷争；以金砖国家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崛起，对世界的贡献日益增大，这些国家需要更大的发展空间和在国际金融体系中的话语权、主导权。这种改变旧秩序的要求，并非历史上简单的后起之秀“夺权”的故事，而是反映了在新的力量格局对比下，国际金融现有秩序更加凸显出其不公平、不公正以及对发展中国家缺乏包容性的特征。

从现代世界体系建立以来，国际金融秩序经历了数次变革，每一次都体现了世界领导者的意志和利益。历史上的霸权国家是通过殖民地来掠夺财富的。18 世纪、19 世纪，英国是世界经济霸主，当时的国际金融秩序是以英镑为核心的国际金本位货币体系。到 20 世纪的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美国

开始取代英国的地位。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美国成为超级大国，西方世界建立了以美国为主导地位的经济金融体系，从规模上来讲也是全世界的主导体系。冷战期间，面对苏联集团的竞争，无论是政治还是经济，美国都是一个对西方经济体相对负责任的霸权国家。对于形成今天国际金融体系至关重要的一些制度设计，如欧洲战后重建的马歇尔计划，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成立，都确立了美国霸权的制度化。但是这一美国占主导的经济体系制度从一开始就存在不公平、不公正的因素。任何国家要取得发展，必须进入这个体系，因为美国控制了所有的经济制度资源，但是进入以后，这些国家就必须依附于这个体系，形成对美国的一种依附型发展。

“冷战”时，美国虽然可以在由它主导的国际经济体系中通过控制美元这种国际储备货币和结算货币获得大量的利益，但美国为了战略上的考量和对付苏联集团，还是会对国际经济秩序负责。一个典型的例证就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建立的布雷顿森林体系，它的核心要点在于“签署在纸面上的、与黄金挂钩的、美元主导的国际货币体系”。美元以自身和黄金的锚定，承担了所有其他货币的价值锚，这在一定程度上也是美国对国际货币体系的责任。但这种责任最终不能对抗“特里芬难题”，到了20世纪70年代，布雷顿森林体系最终崩溃。然而，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的结果是美元和黄金的锚定关系解除，但其他货币和美元之间的锚定并未全部解除，而是在更加频繁的汇率波动下的钉住，体系的内核并没有本质性的变化，只是变成了“无形的、与黄金脱钩的、美国主导的货币体系”。

“冷战”结束后，苏联集团消亡，美国的霸权没有了势均力敌的制约，情况就发生了变化。20世纪80年代以来，金融全球化加速，各国都依附于美国主导的国际经济体系之上，通过美元这个最为重要的国际储备货币和国际几大关键商品市场的结算货币，美国就可以通过技术性的手段将财富转移到自己国家。美国由资本的净流出国摇身变为资本的净流入国。亚洲一些国家的高储蓄率所积累的资本最终流向美国，美国人在消耗这些国家提供的廉价商品的同时，消费他们提供的储蓄。在这种金融体系下，一旦发生危机，美国又可以通过掌控国际储备货币发行而不受国际性约束的权力把危机转嫁